

明史新探

南炳文 著

中华书局

2007

目 录

自 序	(1)
明代的贡献及其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19)
明代文化特色浅论	(26)
洪武祭祀乐章和朱元璋	(33)
朱元璋撰二丘乐章的重视民众思想	(72)
朱元璋大祀天地乐章非用于洪武八年说	(80)
——读王圻《续文献通考》札记	
明代纂修《玉牒》考略	(89)
《万历起居注》的价值和版本	(155)
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	(165)
《万历起居注》的版本	(180)
《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	(206)
天津明抄本和日本藏抄本《万历起居注》	(216)
《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 内阁奏疏	(225)
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	(257)
——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263)
国家博物馆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写时代考	(275)

崔恭年谱	(283)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教训	(310)
王士琦的仕途终点和人品	(333)
明代的不良牙人及其防范	(341)
明代经济领域诬骗窃夺现象的盛行及其防范	(355)
明代载人运货的车	(368)
明代名人与天津	(379)
海河得名臆释	(382)
三岔河口记	(386)
水西庄与天津文化的包容性	(390)
关于天津设卫建城史的几个问题	(396)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	(401)
解释关于天津设卫建城纪念日的一个疑点	(413)
释天津永乐二年设卫建城说的又一个疑点	(416)
释天津卫永乐三年创建说	(420)
天津史上不应忘却的一个人物	(425)
——张思恭和永乐初天津城墙的修筑	
陈逵未参加永乐天津筑城考	(428)
陈逵未参加永乐天津筑城再考	(435)
关于 15—16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440)
——纪念郑和远航开始 600 周年	
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	(452)
黄斌卿遣使赴日乞师时间考	(467)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两种表现	(495)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六种表现	(508)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516)

“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	(525)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531)
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	(578)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	
一部开拓性的清史研究名著	(598)
——郑天挺《清史探微》提要	
读《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	(604)
成弘后明代社会变迁研究的里程碑	(607)
——初读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读滨岛敦俊先生新著《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和民间信仰》	(613)
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	(617)
——读沈定平关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作	
推荐一部重要的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新著	(623)
——杨启樵博士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述评	
杨著《中国社会生活史》序	(629)
何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序	(631)
李著《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序	(634)
天津人口研究的新阶段	(637)
——高著《天津人口研究(1404—1949)》序	
刘著《弘光政权研究》序	(641)
张著《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序	(644)
怀念史学大师李洵先生	(647)
——《李洵先生纪念文集》序	
《广宗县旧志校注》序	(658)
(日)松本隆晴著《试论余子俊修筑的万里长城》译文	(661)

明赵秉忠状元卷今译	(697)
-----------------	-------

附 录

我的治学经历	(704)
--------------	-------

《明清史蠡测》目录	(719)
-----------------	-------

自序

这本论文集收入了本人 1996 年以来的学术文章。主要包括关于明代历史的综合性论述,关于明代文化与文献的论述,关于明代人物、社会及地方史的论述,关于明代中外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学术界研究成就的评述等,凡五部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清史,但基本研究范围限于有明一代,因而全书以《明史新探》为总名。此外,书中还收进了关于明代历史的两篇译文,附录了“我的治学经历”和“《明清史蠡测》目录”两篇文字。两篇译文与明代历史有关,是公元 1996 年以来本人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蹒跚而行的一部分,因而收入本书之中。“我的治学经历”是 2004 年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时应校庆办公室的特别邀请而作的自我学术小结,“《明清史蠡测》目录”登载着本人于 1996 年春出版的第一本自选学术论文集所收文章的题目,它们一起反映着本人的治学历程,对于读者了解本人的治学活动以便惠赐指导或有裨益,所以也收了进来。1996 年至今恰好十年,为时不可谓不长,而在治学上的所得,除著作外,几乎全部收在这本论文集中,成绩竟是如此之少。回忆起来,惭愧之至。

在《明清史蠡测》的“自序”中,本人曾由于学术上微有所获,而对南开大学和学术界诸位师友以及中小学时期诸位师长的教导与帮助、父母的培养和教诲,表达了感谢之情。这里本人对他们再次表达无限感谢之意。本论文集之问世,得力于许多师友之帮助。范曾先生之创意与慷慨解囊,历史学院党政领导门连凤、李治安、陈志强、王立华、蓝海等之主持组织、热诚关怀,都是本人不能忘怀的。高艳林同志之具体编辑、主持校勘,曹琳、雷庆锐、张艳芳、展龙、张毅、张磊等同学之反复

校对,南开大学明史研究室林延清、李小林、何孝荣、庞乃明诸先生及室内各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之用不同方式加以协助,也令本人非常感激,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另外,我还要特别谈几句关于本人的爱妻吴彦玲的情况。她在1961年秋与本人同时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在一个班读书,经同班同学的牵线,第二年下半年我们就订了婚。从此,她在完成自己的繁重的学习、工作任务的同时,任劳任怨地担负起了对本人这个身有残疾之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四十多年来,本人之所以能不分平日假期,每天基本上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钻进研究室全心全意学习或研究,全靠她的自我牺牲、理解和支持。本人的学术文章,她也常是草稿的阅读、讨论修改者。在遇到困难时,她又充当着劝慰、鼓励的角色。没有她,就不会有本人之今日。今年阴历正月初六下午,本人照例午休后到研究室读书,而当三个半小时后回到家中时,她竟已不辞而别了。言念及此,不禁泪流满面。愿她在天堂平安。谨以此文集献给勤劳、慈祥、宽厚、最富爱心的彦玲爱妻!

南炳文写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爱妻吴彦玲仙逝二七之夕

明代的贡献及其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明代的历史地位如何？这是明史研究者应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不仅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明代的历史，从而有利于对明史上的各个具体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而且可以从中引出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为今人和后人提供借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发展。

一 明代的新贡献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对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时期，判断其历史地位是否应予肯定，所应加以考察的，在于它与前朝或前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是否做出了新贡献，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凡是做出新贡献、对社会进步有所推进的，就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新贡献愈多、对社会进步推进愈大，其评价就愈高；反之，没有做出新贡献、对社会进步没起推进作用、甚至拉了历史倒车，则应该给予否定的结论。这是一个通常适用的评判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评判明朝，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正面的，是肯定的。

在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基本上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辅、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要成分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生产力跳跃式发展、财富膨胀式积累、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局面，但只要在较长时期内不出现大面积严重妨碍社会生产的战乱局势，依凭劳动者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生产技术以至生产力的其他方面即可缓慢提高和进步，社会财富的总量也可日积月累地增加起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

加,必然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手工业和商业的日趋活跃,造成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成分在社会生产中比重的降低,久而久之,甚至影响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上种种提高、增加、变化,尽管都是极其缓慢的,然而不得不称之为进步。这样的进步,在明朝 200 余年中是不难看出的。

明朝之所以能够做出新贡献、促进社会的进步,乃在于它能够在 200 余年中大体维持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基本上避免了较长时期内严重妨碍社会生产的大面积战乱的发生。有明一代,尽管发生过多次战争,有明初的统一战争,有靖难之役、平定朱寘鐸反乱之役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有镇压唐赛儿起义、镇压刘六刘七起义、镇压李自成起义等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有对付鞑靼、瓦剌、女真等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有抗击倭寇、驱逐西方殖民者骚扰沿海等对外战争,但从总体上看,除靖难之役期间及明朝末年等少数时期外,明朝在 200 余年中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处于和平环境之中的。明朝 200 余年中能够大体维持和平统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在于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结束了广大汉人遭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局面,使明朝消除了元朝那样民族矛盾一直普遍存在十分尖锐从而易于导致辖境内随时发生大规模民族战争的危险。二在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承认了农民通过元末农民战争获得的胜利果实,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缓和了土地集中的矛盾,使明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有数量颇多的小自耕农,这一方面增强了明朝的社会基础,另方面也推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三在于明朝逐步改变了元朝集权程度不高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和皇帝的权力,分散和削弱了地方官吏及朝中单个大臣的职权,剥夺了地方藩王的参政权和统军权,从而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基本上不易于发动叛乱,即使发动叛乱,也易于镇压,不至于酿成长期的大规模战乱。在中央和皇帝权力加强的情况下,其对付农民起义、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侵略者来犯的力量,也得以大增,从而限制了这几类战争的扩大蔓延。

明朝时期的新贡献和对社会进步的促进,详细罗列难以穷尽,就其主要者,可述如下数条:

一,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上较多地进行了综合经营,使地力的利用较前充分,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甘薯、玉米、烟草等,经济作物棉花等种植广泛。棉织业之弹弓易绳为蜡丝,纺织业之出现结构复杂的花机,陶瓷业之制成斗彩、五彩新品种,造纸业之蒸煮纸浆时已知使用石灰,印刷业之发明套印、短板、拱花新工艺,采矿业之发明以竹竿排放瓦斯,钢铁业之使用上带活塞、活门的鼓风装置木风箱,都反映了手工业方面技术的提高和改进。

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这种状况的出现,时在明代中、后期。其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为出卖而生产的商品性生产有所增多,如河南所种棉花,多归商贩。各地的商业往来,广泛进行,商路贯穿东西南北,《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等商人用书的大量出现,即反映了其时商路畅通的情景。商业繁荣的城市和市镇大量出现。它们或在手工业发达之处,或处交通要道,或为某一地区的中心,其中市镇之出现在江南地区数量尤多。商业资本相当活跃。全国各地皆出商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闽广、关陕、荆楚所出尤多,资本雄厚者为徽商和晋商,其资本多者可至百万。其时从全国经济的总量来看,商品经济尚敌不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超越以前的分量,在个别地方,如南京和苏州,居民的生活用品竟基本上依赖于市场。

三,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较多出现。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而且数量已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未在全部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呢?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有产者,另一方是一无所有但有人身自由的无产者,前者用货币购买后者的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而后将商品出卖、获得高于投资额(购买原料、工具和劳动力等的费用)的货币,从而实现剩余价值的剥削,不断增殖自己的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就是雇佣剥削,

或使用雇佣劳动。但是,并不是说凡使用雇佣劳动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使用的雇佣劳动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算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数量是老板所使用的雇佣劳动的数额达到了使之可以完全脱离劳动的程度。另外,如果社会上偶然地出现了个别可以认为已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标准的生产单位,而这种生产单位由于数量太少、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来说可以略而不计,这时也不能视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当这种生产单位数量已相当多、多得使人们对其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估量时已对之不可忽视,这时才能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当然,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数量也不能过多,如其多到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那时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而不能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了。按照上述理解,明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虽曾在个别时期出现过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单位,但因其数量太少处偶发状态,而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明代,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单位已数量较多,突破了偶发状态,但又没多到动摇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主导地位的地步,明代应该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破土而出了。明代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部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包括榨油业、丝织业、棉布袜制造业、矿冶业等,此外,农业中也产生了这一新的生产方式。

四,产生了与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思潮。这些思潮包括反对孔孟说教束缚、主张思想自由的思想,反对夫权、主张男女平等、否定旧礼教的思想,鼓吹工商皆本的思想,肯定追求私利的思想,以享乐挥霍为正当光荣的思想,以及拜金主义思想等。这些思想在当时说来,无疑都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具有程度不同的积极意义。

五,对传统学术和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大总结。明初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是篇幅空前的大类书,它按照分类汇集的方法,对中国的古代文献进行了一次大摘编,在总结和保存古代文献上具有重大

价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明代后期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徐光启编著《农政全书》,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分别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医药学知识、农业知识、手工业知识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承贡献甚巨。

明朝 200 余年中,虽然做出了新贡献、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未能摆脱一般封建王朝所共有的一个规律——王朝初期土地集中程度相对较低,社会矛盾比较缓和,而中期以后,土地集中的程度就会渐渐变高,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另外,明朝解除了汉族遭受的民族压迫,但解决不了少数族遭受民族歧视、甚至遭受民族压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边疆地区尤其显著,并且随着王朝中后期政治的日趋腐败而日趋严重。到了明朝末年,以上两种矛盾终于皆发展到极为激烈的地步,这便导致了明朝的崩溃,并使广大人民陷入了改朝换代的战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明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个负面影响虽然很大,但掩盖、抵消不了明朝的上述贡献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从这一角度讲,明朝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明朝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是能够不断进步的,其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商品经济部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可以逐渐增加,所占比重可以逐渐提高,这样的变化虽然受中国王朝周期性兴亡的影响而不会太快,但变化是不可阻止的,最终会由封建社会发展至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都较高的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判定中国如无外力影响则将永远停滞在封建社会的观点,绝无事实与理论的根据。

二 明朝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关于明代历史地位的判断,除了上述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适用的一般角度外,还有一个新角度应予重视,即应考察其如何认识和对待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之所以必须重视这个新角度,乃是由于明朝的国际处境与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在 15 世纪以前,世界各国间虽有漂洋过海的洲际远距离的相互交往,但这些交往并非是经常性的,而且一直没有实现所有大陆间的顺畅通航。因而各个国家大体是在海洋的限隔下,按地区处于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国际交往大体局限于所在的地区。但到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由于人类已经掌握了征服海洋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如地球为圆形的地学知识、保证海上定向航行的天文定位知识、能够抵御海上风暴的坚固船只的制造技术、在复杂情况下得以安全航行的驾船术以及其他航海经验等,加之西欧滨洋沿海的地理环境早已培养了其居民较强的通过征服海洋向外发展以获取利益的习性,而其时的欧洲又是小国林立、竞争激烈、各国在本地区获取利益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关于世界的东方极其富裕的传说又在欧洲广为流传,于是遂发生了西欧人纷纷乘船渡海探求通往世界东方之路的活动。1487 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 年至 1502 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先后发现了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等岛屿,当时误认为发现了印度。1498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1499 年至 1504 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谱齐曾多次航行到南美洲北岸,确认为一新大陆,后来就把南、北美洲称为亚美利加。1519 年 9 月至 1522 年 9 月麦哲伦率领的探险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从此世界海上航路大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先后漂洋过海来到世界的东方,各地区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国与国的交往再也不是大体局限于本地区的范围,而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有可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位于地球上其他某个地区的某个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就是从此之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如何认识与对待全球性的国际交往问题。

明朝在认识与处理全球性的国际交往问题上表现如何呢?笔者的估计是其表现有正有误,而误处不可忽视。

当时,明朝具体面对的全球性国际交往,主要的实为与西欧殖民者的交往,更确切地说,是在西欧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东来搜求财富的

情况下,如何应对以使自己避免处于不利地位,保护住自己的权益。仅就明朝时期来讲,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迫切。因为历史上的自他国搜求财富,主要采用两类办法,一是强力掠夺,二是商业贸易,西欧殖民者也不例外,而明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大国,其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成就、综合国力以至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与西来各国相比都不逊色,甚至更为先进,至多是在某些领域互有短长,这使西欧殖民者的两类搜求财富的办法,皆在对付中国中基本失灵。这时西欧传教士到达其他国家(如美洲的国家)后,由于那些国家处于落后状况、实力弱小,即在那里采用强迫传教的方式,迫使当地人一切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甚至强力集中当地儿童,使之与外界隔绝,完全按照欧洲人的样式生活,连说话也要改用欧洲的语言。但对于中国,他们则另用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不是要求中国人欧洲化,而是反过来他们主动中国化——学中国话,穿中国服,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热心传授西方先进于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尽量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现成的词语翻译基督教的著作、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某些与基督教教义中非根本部分并不一致的习俗。这种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可称之为委曲求全。他们为什么这样委曲求全?不言而喻,中国实力太大,使之不得不如此。中国实力之太大,不仅影响了西欧人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了西欧殖民者在中国用强力掠夺方式搜求财富的效果。环顾当时的世界,西欧殖民者已用武力征服了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从而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财富的肆意掠夺,而在中国,他们除了在沿海骚扰并屡遭驱逐之外,并未能实现藉助武力侵入明朝内地以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愿望。西欧殖民者通过贸易从明朝搜求财富的目的也实现得不顺利,甚至可说遭到很大挫折。当时的欧洲在生产技术上并不比中国高明,他们拿不出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制品以与中国人交换,而中国非常精美的丝织和陶瓷制品等,都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口欧洲,从而使中国在与欧洲人的相互贸易中,总是

处于顺差之势,为了弥补差价,欧洲人只好拿出大量贵金属货币——银元交给中国人。明末海澄月港一船船的银元的不断进口,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①。

但是,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想到明朝以后,那么明朝如何应对西欧殖民者东来搜求财富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立即考虑的了。

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在历史上是一条富国、强国的捷径。这种办法只要行得通,就可增加本国的财富。这些国家进行的对外通商贸易,必然对本国的生产提出扩大规模、革新技术的要求,以满足输出交换的需要,并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利润率,这就使本国生产水平的提升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拉动力。这些国家在从国外搜求财富时,为了保证强力掠夺他国获得成功,为了保护本国的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安全,又对改进本国的武器、提高本国军队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这又使本国武力的提升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拉动力。革新生产技术、改进武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的国家,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往往是比较迅速的。由于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有利于富国、强国,这种自国外搜求财富的范围搞得越大,其富国强国的作用就会越显著,并且见效越迅速。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西欧殖民者自国外搜求财富的活动,范围扩大至全世界,大得远非此前限于相对封闭隔绝的各个地区的同类活动所可以比拟,这样,其富国、强国的作用,也就会空前增大,并且见效空前迅速,要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国力就会强大得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于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都将处在它们的极大威胁之中,可见,早在明代西欧殖民者刚刚东来尚未充分强大起来时,中国就应早作准备,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人强我弱局面的出现。

面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明朝正确的应对措施应是什么呢?主要的应有如下几项:一是迅速弄清西欧殖民者的来历,弄清其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弄清其漂洋过海到东方和世界各地的目的,进而

^① 参见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

分析、预测其向外搜寻财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提高在战略上准备抵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自觉性;二是从道义上讲,虽不可效法西欧殖民者的强力掠夺,但要效法其发展海外贸易,借以分享海外贸易增殖国家财富的益处和其他益处;三是积极全面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取长补短,使提高国力得到坚实的保障;四是加强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防止武力落后于西欧殖民者。

对于上述几项应对措施,明朝可说是程度不同地全采取了,可是,哪一项也谈不上做得十分理想,不可挑剔。关于了解西欧殖民者的各项情况,明朝可以说进行得很不充分。凡是遇到与西欧殖民者有关的事端,明朝免不了要向其人查问来历等情,或者查阅中国文献,寻找有无有关记载,但基本上仅限于此。日本在17世纪上半叶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传教后,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海外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动态,其江户幕府要求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荷兰风说书》,其中所记即以荷兰商馆长及荷兰商船人员所提供的欧洲各国的动态为重点,现存的这种《荷兰风说书》,高达184个年份^①。这反映了日本对了解西欧殖民者情况的积极态度。而明朝始终没有类似的举动。另外,明朝更没有派人到欧洲去考察。因此,直至明朝灭亡,其关于西欧各国的知识,仅限于来华欧洲人的自我介绍,停滞在不甚了了的阶段。清代雍正、乾隆时成书的《明史》,竟称西班牙、葡萄牙为“佛郎机”,其地理位置“近满刺加”,这种糊里糊涂的无知状况,既反映了清代对了解西欧殖民者国情的忽视,也说明了明朝在这一方面的严重欠缺。

关于效法西欧殖民者发展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做到了有限度地容许私人海外贸易自发进行,而没有主动予以帮助。如所周知,明朝中期以前官府屡下禁海令,不许私人经营海外贸易,其盛行者仅为官府控制的厚往薄来的赔钱买卖——朝贡贸易。明中期以后,朝贡贸易因西欧

^①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2001年6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62页。

殖民者东来的冲击而衰落,民间海外走私贸易发展起来,至隆庆年间,官府通过开放海澄月港,承认了其合法性,但严加限制,出海船只的大小和数量、载货的种类和多少、出海地点和目的地以及来往的期限等,均有严格监控甚至限制,用时人的话说,这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①。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在明中叶以后允许进行了,但仅限于已知的比较熟悉且不敌对的亚洲国家,西欧国家仅限葡萄牙一国。很显然,这与其时西欧各国之大力支持发展海外贸易相比,从总体上看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明朝可说是做了不少工作。除了少数顽固派之外,明朝皇帝和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对于这一点是比较积极的,西方人使用的先进火器佛郎机、西洋大炮等,他们发现之后往往即予仿制。当耶稣会士确定以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为传教手段后,他们更是与之积极配合,帮助其译著有关书籍,经常与之讨论各种学问,从而使明朝末年输入了许多西方关于天文历算、地理学、医学、物理、水利、武器制造等领域先进于中国的知识。不过,在这一方面明朝做得也有缺陷。要想最有效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必须首先学好外国的语言文字,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尽可能多地把其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学过来。在这一点,日本在通过长崎与荷兰接触时做得较好。日本的幕府很注意培养荷兰语的翻译,这使较多的日本人掌握了荷兰语,从而使其在学习西方学问时很有自主性,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明朝不重视学习西方的语言,这便使得中国人不能直接阅读西方的文献,当时的译书只能采取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受的方式,译书的选择完全掌握在以传教为主要目标的西方传教士手中。这无疑使得其时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影响了学习的系统

^① 许学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0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